

关于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

吴汝康

人类起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前国内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和猿的界限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从猿演变成人,是一种大的质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人类各种重要特征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过程,从猿到人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能制造工具。过渡时期的生物或“前人”已能两足直立行走,经常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来防卫自己和获取食物,实行着杂乱性交关系,过着原始群的生活,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我^[1,2]和一些同志^[3]持这种看法。

另一种意见只说制造工具是人和猿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只字不提这个鸿沟是怎样形成的过程。因而避而不谈过渡时期,自然更不会提出什么是过渡时期的起迄和特征。例如安志敏同志过去和最近都持这种看法^[4]。

安志敏同志说我的观点是庸俗进化论。他说:“把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看成是逐渐演进的,而根本否认了发展中的突变、飞跃的可能性,这属典型的庸俗进化论。”什么是庸俗进化论呢?庸俗进化论否认生物进化过程中有质变或飞跃。安志敏同志认为制造工具是一次质变,我也认为如此。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从猿演变成人只有一次质变,人类的各种特征都是突然产生的;而我则认为有一次

以上的质变或一个质变的过程,从猿到人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人类的各种特征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人类能两足直立行走,猿类只能半直立行走;人类能劳动,猿类不能;人类能制造工具,猿类不能;人类有自觉的能动性、意识、语言和社会等,猿类没有。人类的这些特征,按照安志敏同志的意见,只能是突然出现的,只要古猿一旦能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做成一块石器时,便好象是来了一次9级的大地震一样,人和猿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瞬间就造成了,人类的各种特征便全都出现了。这究竟是辩证唯物论的进化论呢?还是形而上学唯心论呢?

在这里附带提一下,有人以为猿人既有猿的性质,又有人类的性质,因而以为猿人阶段就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这是从猿人两字的字面理解而来的一种误解。因为猿人已是真正的人,而不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的生物了。猿人已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不过是原始的人。猿人阶段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低级的阶段,而不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

现有的科学事实表明,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那末,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形成的呢?根据在世界各地发现的第三纪上新世和中新世的古猿化石,一般认为人类大概是在一、两千万年前开始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而开始能制造工具的人类的出现,最早距今不过三百万年,因而其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早期的化石代表可能是腊玛古猿,这是在晚中新世和早上新世发现的一些上、下颌骨破片和牙齿,总共不

过十四、五件。它们的形态性状与时代较它为晚的南方古猿有些相似。从整个形态类型来说,应归属于人科。从其犬齿较小和其前部齿列减弱来推测,可能是天然工具使用者。推测这类古猿已能经常两足直立行走,但它们的头下骨骼化石至今尚未发现,因而还难于肯定。但从整个进化过程来看,这种从猿到人的早期的过渡类型应是存在的。

南方古猿的原始类型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晚期的代表。

南方古猿的化石最早是1924年在南非发现的。近十多年来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

总括来说,南方古猿类化石从1924年开始发现,迄今已整整半个世纪。在大约前一半时间内,总的倾向认为它是猿,在后一半时间内,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一般都认为它是属于人的系统。由于有大量骨骼化石,特别是肢骨化石的发现,可以肯定南方古猿已能两足直立行走,虽然还不完善。而直立行走是人在体质形态上区别于猿的标志,恩格斯说:**“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恩格斯还把这句话加了着重号。应当肯定,这是一次质变。南方古猿类的年代从五百多万年到大约一百万年前,在大约三百万年前,其中一些进步的类型开始能制造工具,成为真正的人,进入早期猿人的范畴,如肯尼亚发现的“1470号人”和坦桑尼亚发现的“能人”等。其余的南方古猿则特化成为人科的旁枝。

人类的基本特征,有些可从直接的实物证据来确定,例如能否两足直立行走可从发现的骨骼化石来确定,能否制造工具可从有无人工打击的石块来确定。但是其他的人类特征如意识、语言、自觉的能动性和社会等便难于从直接的实物证据来确定。近年来也有人从南方古猿的脑模和现代黑猩猩的生态等资料来推断南方古猿已有始基性的语言,但还难于肯定。可以肯定的是两足直立行走的

姿势是很早就出现的,远在工具的制造之前,表明人类的各種基本特征不是同时起源的,而是渐次形成的。人类的各種特征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突然出现的。

然后从理论上来看人类特征形成的问题。

安志敏同志最近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是“人和猿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这不无可商榷之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说:**“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请注意恩格斯这里说的**“从此”**两字。恩格斯是根据人是从猿进化来的理论,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才说**“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明显是指已经形成的人和猿的差别。而安志敏同志却抹去了这一系列前提,割断了人和猿的联系,断章取义地只提“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前提,那末请问安志敏同志,人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

再来看看恩格斯写“导言”这部分时的背景和以后一系列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论述,也明显可以看出安志敏同志的理解究竟是否正确。

“导言”是1875—1876年写的。在此之前,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的理论。赫胥黎在1863年出版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提出了人、猿同祖论。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起源》一书,明确阐述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恩格斯在这种背景下,在1876年写作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著名论文,指出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作了上述的论述。

随后恩格斯在1879年底写的《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一章中就说:**“[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

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细颚龙和始祖鸟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上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整个生物界是这样，那末，是否人和猿之间的界限是例外呢？不是。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他说：“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安志敏同志所以会作出前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辩证法中的量变和质变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只知道有爆发式的质变或飞跃，而不知道还有非爆发式的质变或飞跃。而自然界的大量的质变，包括生物进化中的大量质变却是非爆发式的。恩格斯说：“**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自身完全由飞跃所组成。**”这在安志敏同志看来，是否也是“庸俗进化论”呢！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强调了质变有不同的形式，指出质变可以采取爆发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非爆发的逐渐过渡的形式。我国有些哲学工作者曾指出古猿变人的质变或飞跃是非爆发式的，他们说：“非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在这种飞跃形式下，旧事物向

新事物转化时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类人猿变为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没有外部冲突的飞跃过程。”^[5]

关于生物进化过程中新种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物种形成的问题，曾经有过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渐变的观点，认为物种是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是骤变的观点，认为新种是通过大的突变一下子产生的。现有的生物研究成果表明，在进化过程中，新种可以通过渐变产生，如通过地理隔离的渐变分化而形成，从一个旧种产生几种新种，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继代形成，从一个旧种产生一个新种。这种形式主要见于动物界。新种也可以突然产生，如通过异种杂交的多倍体的形成，这种形式主要见于植物界，特别是显花植物，在动物中则很少发生。人类的产生则是前一种形式中的继代形成。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质变中也有量变。量变是一个长的过程，逐渐过渡式的质变也是一个相对的长的过程。

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在相对地较短的时间内一系列的质变迅速出现（其中最主要的是制造工具），究竟是把除制造工具以外的质变作为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呢？还是把这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呢？这个问题还有待哲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安志敏同志坚持的人类突然产生的观点既与现有的科学事实不符，而且在哲学上错误地把一切质变都理解为是爆发式的。“人和猿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简单化的提法，是割裂了恩格斯的论述而得出的绝对化的理解。

我认为，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现有的科学资料表明，直立行走是这个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制造工具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标志，是一次大的根本性的质变，人类从此诞生。

恩格斯从生产劳动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伟大理论。两足直立行走的重要含义不仅在于这种行动的方式,而更在于这是人类其他重要特征产生的必要前提。如果不能两足直立行走,使双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便不可能经常使用天然工具进而能制造工具,以从事社会性的生产劳动;如果不能两足直立行走,脑子便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语言器官也不能形成,意识、语言和自觉的能动性便不可能产生。

在制造工具以前,必然有一个经常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如果不知道经常使用天然工具,很难设想会有制造工具的需要。虽然这个过程目前还无法用实物来证明,但这和直立行走出现在制造工具之前的事实是一致的。

制造工具不能一点没有意识的作用。制

造工具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为了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不然,使用制造的工具和使用天然的工具来进行生产劳动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因而可以设想,意识及其外壳的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

应当说明,目前关于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的直接证据,还较少发现。关于人类某些重要特征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还了解不多。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参 考 资 料

- [1] 吴汝康,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2 (1974), 3, 181.
- [2] ———,科学通报, 19 (1974), 8, 364—369.
- [3] 林志纯,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1973, 2, 81—92.
- [4] 安志敏,科学通报, 1963, 5, 35—40; 10, 34—39; 20 (1975), 2, 69—75.
- [5] 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 1961, 112.

关于巨猿以及人和猿的界限问题

安 志 敏

最近在我国刊物上所开展的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弄清人和猿的本质区别以及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基本理论,是十分有益的。

从1962年吴汝康同志在《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一书中,把人科分成两个亚科,提出了“生物人”、“社会人”以及“天然工具”等概念以来,我多次提出过商榷^[1],吴汝康同志也逐次做了答复^[2]。遗憾的是,并没有正面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往往纠缠于某些枝节方面,这就无从解决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场讨论中,吴汝康同志可能意识到论点本身的薄弱环节,自1963年以来,就逐渐变换了提法或者回避他所提出过的某些概念,但是,论点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为此,本文准备对吴汝康同志的主要论点进行再商榷,希望

通过讨论以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和解决。

一

关于人和猿的界限,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基本理论问题。

有关人和猿的界限问题的争论,是从讨论巨猿的系统地位开始的。首先在《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这本专著里,吴汝康同志开始提出:“我们同意把人科分成两个亚科,真人亚科和前人亚科。真人亚科包括能制造工具的人,开始有社会组织,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叫做社会人(Social man);前人亚科包括营地面生活,能近乎直立或完全直立,但脑子还较小,虽然能利用自然的木棒和石块等来获取食物或作防御或攻击之用,但还不能石块